

苦斗集

史莽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史 莽

苦斗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徐正伦

封面设计：邵秉坤

苦斗集

史莽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207000 印数0001—1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346-3/I·323 定价：4.10 元

目 录

家乎？商乎？	(1)
突破	(3)
棍子	(6)
医案	(8)
不解之缘	(11)
说爱	(13)
忏悔吧，有罪的人们！	(16)
鲁迅的遭殃	(19)
逆反心理	(22)
春节遐想	(24)
莫当“丑角”	(27)
从阿Q想起的	(29)
时髦的“沉浮”	(31)
扁鹊与桓侯	(33)
读史益智	(36)
方励之的评语	(38)
“土电影”赞	(40)
拜金与戕命	(42)
言者心声	(44)

随想	(46)
如果眼睛向下看	(49)
当心公害	(51)
医生与僧人	(53)
漫谈春节晚会	(55)
革命传统	(58)
危机感	(61)
门外商谈(上)	(63)
门外商谈(下)	(66)
“失重”的必然	(69)
“迷你”言论	(72)
“蛇口风波”漫议(一)	(74)
“蛇口风波”漫议(二)	(77)
从“现代艺术展”说到“四大文学”	(80)
《末代皇帝》引起的怪事	(83)
读《说台风》	(85)
新闻版本学	(89)
历史是公正的	(92)
当代大学生小议	(95)
《五·一六声明》浅析	(99)
知识分子的大节	(104)
奇文共欣赏	(109)
谣言可畏	(113)
思想阵地之争夺战	(116)
警惕“毒杏仁”	(120)
一九九〇年遐想	(123)

* * * *

诗界	(127)
天竺石	(129)
诗的语言	(131)
起哄和耍态决不是战斗	(133)
西湖功臣	(138)
再谈西湖功臣	(140)
三谈西湖功臣	(142)
漫谈“青天”	(144)
谈《拈花集》	(146)
谈《鲁迅藏汉画像》	(148)
“运木古井”考(辨伪之一)	(150)
“济公骂秦桧”辨(辨伪之二)	(152)
“济公塔院”析(辨伪之三)	(154)
普陀历史的另一面	(156)
得奖后的“反思”	(159)
奢风与“清贫”	(162)
纸船明烛照天烧	(165)
对鲁迅也应当公正	(167)
抗战文艺的一点思考	(171)
岳飞墓庙诗话(上)	(175)
岳飞墓庙诗话(下)	(177)
笑声后的哭声	(179)
抵制和清除“精神垃圾”	(182)

* * * *

漫谈“济公”其人其事	
——不是考古的考古	(185)
论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	
——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	(194)
论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	
——兼论鲁迅的人物观	(226)
关于创作论的几点思考	
——简评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	(245)
铜像竖在异国的杭州人	
——纪念孙用逝世五周年	(257)
抗敌演剧四队在杭州	
——纪念抗敌演剧队建队五十周年	(270)
毛泽东的鲁迅观	
——评“非毛化的贬损鲁迅论”	(283)
后记	(302)

家 乎？ 商 乎？

读鲁迅的书，常常使我感动。记得读到《写在〈坟〉后面》的这一段话，就拨动了我的心弦：

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鲁迅写的是一个作者的心情。他怕他的文章——“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这种心情是感人的，充分显示了作者对读者的强烈责任感，也是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我现在想到的是出版者的问题。现在合法、非法的出版单位可谓多矣，从事出版者以万计，出的书以亿计。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出版者对读者、对社会的责任感如何呢？有人感慨如今写书难、出书难、卖书难、买书也难，可见有责任感的大有人在。但是当那些内容荒唐、情节离奇、思想消极、情趣低下的武侠、凶杀、色情、灵怪、宫闱等等小说，铺天盖地、千万册上亿册地向广大青年倾销

时，当这些出版者因此而从青年的衣袋里掏得一把把、一叠叠沾有汗水的人民币时，我不清楚这些出版者的心情究竟如何。是内疚，还是高兴？是深怕这些“读（毒）物”毒害了纯朴的青年，还是“只要钱到手，一切管他娘”？

有个省的出版社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要做出版家，不出版商！

这口号提得好。说明这个省的出版社对读者、对社会有责任感。但我觉得他们提出的这口号还是比较厚道的。其实商人也有几等几样，有“将本求利”的守法户，有投机倒把的暴发户，还有造假药、贩毒品的违法户——即老百姓平日所骂的奸商。故对出版者的某些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做出版家或出版商的问题，而是：切莫做骗人钱财、戕人生命、坏人心术的出版奸商！

【一九八六年春】

突 破

“突破”这个词汇，大约是军事术语吧，如突破前沿阵地，突破马奇诺防线，曾见于军事著作。

近几年来，“突破”这个词汇，不知怎么一来，却成了时髦的响亮的新词汇。科学上有新发现或新发明，就说科学上有了什么新“突破”；文艺上有新见解或新创作，就说文艺上有了什么新“突破”，真使人感到现在好像进入了“突破”时代。这“突破”的响亮口号，几年前也曾喊到鲁迅研究这一领域里来——鲁迅研究要有新的“突破”！

所谓“突破”，在学术上或创作上究竟是指怎么一种状态，我实在不甚了了。譬如鲁迅研究吧，我常望文思义地想：究竟向哪里“突”呢？需要“破”什么呢？于是我就留心这方面的文章。

果然，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鲁迅研究近几年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文章，发表了这样一些高见：鲁迅是象征主义者呀；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意识流”在中国的鼻祖呀；在文艺观上，鲁迅是弗洛伊德的门徒呀；鲁迅与新月派的论争中，梁实秋是正确的；鲁迅答徐懋庸的长信，写得“失实”，或“火药太大”；“鲁货太多”，“鲁化”严重，“何必言必鲁迅”；鲁迅被“神化”了，等等。这些大

约就是所谓“突破”性的“论著”吧？虽然好像只是一些小小的“突破”。

大“突破”终于来了！《青海湖》发表了《论鲁迅的创作生涯》（简称《论生涯》），可谓“一鸣惊人”：此文煞有介事地把鲁迅的整个创作生涯，划分为“准备”、“创造”、“衰退”三个时期。把鲁迅的作品，区分为“模仿之作”、“泛泛之作”、“充数之作”、“游戏之作”，总之，是“三流之作”；至于杂文，更不用说了，“是鲁迅创造力衰退的又一例证”，是“为了吃饭”的赚钱之作，“缺乏文学价值”……。这确是个大“突破”！它不但“突破”了鲁迅，而且还“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

中世纪的僧侣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哥白尼对此来了个突破：宣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现在有人对“地动说”又来个“突破”：太阳确是绕着地球转的。牧师神甫们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达尔文对此来了个突破：证明人是猴子进化而来的。现在有人对“进化论”又来个“突破”：人确是上帝创造的。国民党反动派判定鲁迅是个“堕落文人”。毛泽东对此来了个突破：论证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文学家、伟大思想家和伟大革命家。现在《论生涯》对“伟大说”又来个“突破”：什么思想家、革命家，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就算文学家也只是蹩脚的，“三流”……。

可见“突破”者，漂亮的词汇也。究竟是好是坏，是科学的还是反科学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需要看其实质：有的向前“突”，有的却向后“突”；有的是“破”谬误，有的却在“破”真理。

同时我怀疑《论生涯》的“突破”，并不是作者的创见，是有来历的。了解国外“信息”的人，不难找出它的出处。某个国际组织聘请的某位先生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迅早有类似的“突破”。故《论生涯》的这次壮举，严格地说，称不上什么“突破”；恰恰相反，倒是一种“钻入”，即“钻入”到别人的“唾余”之中去了。

《论生涯》对鲁迅的这种“突破”，是当年提倡对鲁迅研究要有新的“突破”的人始料所不及的吧。倘若原就料到，或者甚至盼望有这样的大“突破”，那就可怕了！

〔一九八六年春〕

棍子

过去有一种很不好的做法，一听到不顺耳的言论，就打“棍子”；而且“棍子”之重，实在吃不消。譬如，你说在封建社会里，包拯、海瑞这些清官还不错，“为民请命”，多少为老百姓做了点好事。于是“棍子”就打来了：你美化封建官僚，清官比贪官还坏，“为民请命”是对当今领导不满……，打得你爬不起来。清官不讲，那就讲“草寇”吧，说林冲如何被逼上梁山，武松为什么血溅狮子楼，鲁智深怎样拳打镇关西。于是“棍子”又打来了：林冲指谁？谁逼了他？谁是毒死武大郎、霸占潘金莲的西门庆？镇关西影射哪一个？你“借古讽今”，是对当今制度不满……，又打得你爬不起来。

这种打“棍子”的做法，伤害了许多人，因此从上到下，都深恶痛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打“棍子”列为“三不”的内容之一，得到了党内外的一致拥护。

可是近几年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

譬如，你若对某位作家说：“你一味关起门来‘自我表现’，当然也无不可。不过门外‘四化’搞得很热闹，你去看看，表现一下如何？”你就可能得到这样的回敬：“你这是‘棍子’！”你若对某位诗人说：“朦胧诗这玩艺儿，大

约是新事物吧？希望不要写得太朦胧，弄得作者、读者都懵懵懂懂。”你又可能得到这样的回敬：“你这是‘棍子’！”你若对某位舞蹈家说：“你迪斯科、霹雳舞跳得真得劲，你爱跳就尽管跳吧。不过，中国自己的舞蹈，有的还不错，你不妨也试试。”你仍可能得到这样的回敬：“你这是‘棍子’！”你若对某位歌唱家说：“你的嗓子真好，音色真美。只是你唱的中国歌，我就是听不懂。怎么这样怪声怪气，洋腔洋调的？”你同样可能得到这样的回敬：“你这是‘棍子’！”你若对某位文艺理论家说：“外国的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论’，你先生的‘信息’真灵，背得真熟。不过中国过去的历史、当今的现实，你似乎还得了解一下……。”你更可能得到这样的回敬：“你这是‘棍子’！”

“你这是‘棍子’！”——成了一条大“棍子”，打得不同意见的人只好闭口无言。

听到不顺耳的言论就打“棍子”的做法，应当杜绝；不然，要想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是有困难的。这种称不同意见为“棍子”的“棍子”，也应杜绝；不然要想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同样是有困难的。

【一九八六年春】

医 案

著名中医往往把他的治病处方，立成医案，供人参考。明人江瓘父子编的《名医类案》和清人魏子骥编的《续名医类案》，可说是明清以前医案的集大成者，每条案例有病状、有处方、有效果，即使不学医的人读起来，也觉得有味。医生立下医案，确是传授经验的好办法；不过对医生本人也有点危险，就是他的治病处方，除了供人参考外，也有受人批评的可能。

我熟悉的几位话剧界的朋友常来诉苦，说现在话剧上演很少，上演时观众也很少。为了维持剧团，只好“以副养文”。上者出外“打零工”，在电影、电视剧中当个“一溜”演员；中者去教舞蹈，或担任时装表演的模特儿；下者只好在本团办的咖啡厅当服务员。因此，他们忧心忡忡地说：“话剧危机深重！”

富有战斗性的话剧近年来不景气，确是事实。这危机如何解决？于是出来了不少治“病”的“医生”，有了不少“处方”。这些“处方”是否有利于“病”，我非行家，不敢妄评。但有一种“处方”，由我这个外行看起来，也认为未必对“病”有利；弄得不好，恐怕还要加重“病情”。

这种“处方”，姑且称为“形式革新论”。

据持此论的“医生”说，现代是个高技术、高信息的时代，在这个“现代科技和信息社会里，要求从更高层次即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探索戏剧的本质和命运”。据说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中国的话剧只有老老实实在地跟上这个“潮流”，否则无法起死回生。如何跟上这个“潮流”呢？这类“医生”于是开出了如下高明“处方”：

必须突破“熟、老、旧”的戏剧形式，进行“多元的裂变”：裂变为“无情节、无故事、非因果、非逻辑”的“艺术抽象”，什么“三一律”、“四堵墙”、矛盾发展、性格塑造等传统、法则、规律统统打破，只剩下“理智”和“哲理”。“一个戏提供的思考达到一个什么层次、什么深度，就决定了这个戏质量的高低”，有时质量“高”到“甚至不为大部分群众所接受”，那也无所谓。这还不够，还提出话剧要成为一种“界限和法则消失严格定义”的“一种混合交错”的艺术；还要与其他艺术“合流”、“交叉”，话剧自身则趋向“返璞”、“回归”，逐渐发展成为“马戏团式”、“汉代百戏”，直至“还要早的泛戏剧”。

这真是“哲理性”的“处方”，可以概括为：与人治病，灭其特性；人类退化，化为猢猻。

“庸医杀人”，世之常谚。我不仅怀疑这“处方”能否治好话剧的危机，而且还怀疑当前话剧的危机，与开这类“处方”的“医生”有关。

这类“医生”还有一些高深语言，有如符咒：如“戏剧结构模式的层次时态的单调”、“多维交叉与整体模式的直喻”、“艺术家的审美观点即客观世界的审美形式和审美主

体”等等。虽然有人劝导我们对此不必“犬惊小怪”，不过我看不懂却是真情，故对此只好存而不论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